

# 试论张天翼讽刺小说的语言艺术

潘子彦

杰出讽刺小说作家张天翼继承和发展了鲁迅开创的现代小说的讽刺艺术传统,把现代讽刺文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笑的锋芒对准着三十年代中国黑暗社会的种种弊端,真诚而深入地喷射着灿烂的讽刺火焰。

他的讽刺对象主要是两大类人,一是“中流社会”的灰色人物,诸如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在爱情场中表现为虚伪以笑的“俊男倩女”、拼命“往上爬”的人物;二是官僚地主及其流氓恶棍。作家擅长描绘生活的横断面,抓住一点及时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而与他速写才华相一致的则是他语言运用上的诡奇的夸张。可以说,张天翼讽刺小说中的语言特色是在他的敏锐的切取生活横断面的土壤中生根开花、大放异彩的。

## 一、自然、贴切、传神的对话

对话多于环境描写,“把人们嘴里说得出的话写到纸上”<sup>①</sup>,有时候勾勒了讽刺人物夸张而又高度性格化的形象,有时候则揭示了讽刺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这是张天翼讽刺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

著名短篇小说《包氏父子》中的老包在某公馆干听差,他幻想儿子小包将来能爬上去,自己好当个“老太爷”,因此他省吃俭用,忍辱负重。然而,旧社会这个大染缸已逐渐把不争气的小包变成了流氓。可怜的老包仍执迷不悟,尽力满足儿子的要求。在小说中,老包和小包仿佛不是父子关系,倒是成了子父关系。小包对老包说话的习惯是不耐烦地重复词语,大声喊叫,“你去缴,你去缴!我不高兴去说情,人家看起来多寒伧!”小包要老包去买搽头发的油,老包为了省些钱,向他人讨了些油。小包勃然大怒,喷了老包一脸白星子,“我要的是司丹康!司丹康!司丹康!懂吧,司丹康!”小包连珠炮似地一连说了四个“司丹康”,究竟谁是老子,谁是儿子?作家巧妙地利用了人物对话,采取夸张的手法,使讽刺人物的形象高度性格化,

同时两种类型的奴才呼之欲出,小包想出人头地,但在半殖民地城市里养成了流氓习气,不可能走十年寒窗功成名就之路,他只能当上资产阶级花花公子郭纯的小奴才,老包是封建型的老奴才,他把被主子剥削所剩下的一点血汗钱全部献给儿子,幻想“现在他吃你的,往后你吃他的”时,小包早已不认这个爹了。在作家笔下,老包和小包既体现了他们的性格共性,又有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

这种夸张而又性格化的对话,在张天翼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在《善女人》中,念佛老太婆是这样骂儿子媳妇的:“陀佛,那谟阿弥……婊子儿子!死了要炸油锅的!”在《笑》中,地头蛇九爷如此穷凶极恶:“杨发新不过是个田夸老,他竟敢到我头上来动土——哼,老实不客气,叫他吃点王法!还叫他老婆也上我的钩!看我姓杨的斗不斗得过他!……”在《反攻》中,独眼龙为了巴结土豪劣绅成业恒,口出狂言,信誓旦旦:“成先生你知道我独眼龙顶重义气,我独眼龙给你保镖——他冯的,我说的,天听见的。”什么人物说什么话,句句吻合身份,又字字使人物性格化。

短篇小说《皮带》叙述了邓炳生因穷困潦倒,来找当处长的姨爹,希望在军队里谋个差,幻想有一天也能爬上去。后来处长给了他少尉司书的差事,他兴奋得忘乎所以,感到前程无量。可是才三个月,他因处长的调走而被革职,他竟跪在斜皮带前失声痛哭。张天翼通过人物对话,将邓炳生向上爬过程中的微妙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十分细腻而又传神。

邓炳生为了早日得到姨爹的“栽培栽培”,心急如焚,他问梁副官:

“五哥看我这次事情找不找得成,你

<sup>①</sup>张天翼:《创作的故事》,收入《创作的经验》,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版。

说？”

“慢慢地来，急什么？”

炳生先生叹口气，可是把气拼命屏住，不叫给梁副官听下去。

“你愁什么，”梁副官舐舐手指，翻着账簿。“事情问姨爹要，要不到就住在这里吃，慢慢地来，哈哈。”

“说是……不过……。”

那个似乎一心在账簿上，嘴里慢慢地来，

“不要紧的，时气一来事情就盯着你来。急也没用，‘欲速则不达’，哈哈。”

炳生先生打个哈欠，到新铺的床上躺着。

“女子也当少尉准尉，”对自己说。

这段人物对话加上画龙点睛的神态描绘真是相得益彰。一边是“慢郎中”梁副官一而再、再而三地“慢慢来”“哈哈”，恰似一个“坏鹅”。一边是急性子炳生，盼星星盼月亮，望眼欲穿，一心想着“斜皮带”，一心想着“往上爬”。尽管此时邓炳生求官的急切心情表现为欲说无言的“说是……不过……”，但是，“女子也当少尉准尉”恰恰生动地折射出邓炳生微妙的内心世界，让人感到这一人物的可笑可怜又可鄙。

可是，一旦当炳生顶上了司书的缺额，头上有了顶少尉的帽子，到差仅三个月，且看作家笔下的炳生：

喊人的时候，炳生先生也学了梁副官的，用九成鼻音。

“江斌，江便。……喊你怎样不来，嗯？……有的事情做惯了的，还是要嘱咐，真是！……”

于是，昂着脑袋，硬着脖子，叫江“便”铺被，倒茶，等等。

一副做官当老爷的神气活现，全忘了先前的低声下气，是那么的令人可恶。“斜皮带”的到手维系着炳生人物性格的变化，他的思想演变过程，通过他自己的口充分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既活灵活现，又自然可信。

张天翼对讽刺人物内心的无情剖白和曝光，使人物更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它不仅深化了讽刺人物的形象，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一个题材》中主人公庆二伯娘是个靠放印子钱生活的老寡妇，是个嗜血成性的“蚂蝗”，连卖文为生的翰少爷回到家乡，也不放过要敲他一笔钱。她厚颜无耻地找到翰少爷：“……你的事情我都晓得，你写文章卖大钱。”“嗯，你这种生意总是好生意呀，不要本

钱的。只要几张纸——这算得了什么呢。……人家做生意总要花一注大花边，还不晓得蚀不蚀。你的呢——是稳的；只要写下子写下子就赚了一大笔。”

因为翰少爷一“不要本钱”，二“不会蚀本”三写下子“就赚了一大笔”，在庆二伯娘看来这远比她放印子钱要本钱合算得多，世上有这等容易赚钱的。于是“蚂蝗心”里不平衡了，她妒忌了，她的眼睛发红了，她要请翰少爷“高抬贵手”，帮她“孤老太婆一个忙”。当然不是“要钱”，也“不费事”，也“不要本钱”，她把深藏在心里的话儿抖了出来：“我想请你替我一替我一替我写半天文章。”写文章为了什么？为了“卖出来的钱周济周济我，也是积阴德”。看，庆二伯娘这孤老太婆说得多么的委婉动听，她要别人施仁慈，积阴德，就是不晓得自己也该积功德，讲仁爱。当翰少爷告诉他，写文章她必须提供新鲜的材料时：她嗓子因此而尖叫，眼睛因此而发亮，腮子因此而快活得哆嗦。“我的事情我告诉你——随你要听哪一桩。”甚至“只要卖得了大花边，管它什么恭敬不恭敬呢！”最后她为了满足自己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欲望，吞吞吐吐，羞羞答答把她和族绅解太爷男盗女娼、偷鸡摸狗的事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从而戳穿了她守寡“守了五十几年节”是一个天大的谎话，末了她还恬不知耻地关照翰少爷：“今天讲的这个——你千万莫告诉人哪。”张天翼通过人物的言行，一层一层揭去老寡妇“孤苦伶仃”的伪装，暴露她虚伪，贪婪，卑鄙的本质，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既要当婊子，也要赚大钱，又要立牌坊的庆二伯娘的形象在读者面前树立起来。

## 二、漫画式的语言动感

动词使用的准确、生动。作家十分擅长使用动词，而且给人一种形象的动作感，既勾勒了人物，又夸张了人物形象。

《皮带》中的邓炳生，打算请梁处长“栽培栽培”。作家这样写道：“把一支铺盖、一个网篮，用洋车拖进处长公馆里的时候，炳生先生袋里只剩了块把钱。他打算吃住在梁处长公馆里。可是梁处长抬起头，眼珠从鼻尖两旁射下来，眉毛中间打三条皱纹。”一拖一抬一射一打，别小看了四个动词，它使人物形象顿时鲜明突出，意味深长而又力透纸背。与其说炳生是被洋车“拖”进梁公馆，不如说是炳生死皮赖脸借着裙带关系而硬“挤”进去的。而梁处长呢，他之抬头，他之射光，他之眉心打结，这一连串的动作，暗示了炳生“横竖不是

外人”，只得住到处里去。至于邓炳生“瞧着太阳，打了喷嚏，幻想也从喷嚏里喷了出来”，及至后来，他听说可以顶司书缺额，顿时热血沸腾，“额头上沁出了十来点汗”。它是那么的明快，那么的洗炼，那么的传神；同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在《包氏父子》里，这种语言的动感，不但给人以视觉形象，而且给人以听觉形象。

小包外出，“发亮的皮鞋在人行路上响着：橐、橐、橐、橐、橐”。声音何其久远。他回家时，从不用手开家里的门：“突然——砰！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声音之响，弹力之足，如闻其声，如见其门。作家描写小包看书时的情神更绝了：“他拖过一本书过来随便翻了几下，又拿这翻书的手抹抹头发。那本书就象有弹簧似地合上了。”这小包——留级生——“花花公子”，能看书吗？他始而“拖”书，继而“抹”头发，终而“合”书。瞬间的动作，瞬间的变化，却留下了回味无穷的人物形象。

在《脊背与奶子》里，这种语言的动感表现得更为强烈：长太爷“左腿叠在右腿上。”“腿子抖动得几乎跳起来。那片爪子壳在大襟上站不住，弄得东奔西奔的，一个不留神就给摔到了地下。”这一段看似无关紧要的动作描绘，其实正是暗示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长太爷，其内心正有一颗淫心在剧烈的飞荡。

还有《我的太太》，“这种人又逗人爱，又不逗人爱”。瞧她：“手在鼻子上那么一撮，一条黄色的鼻涕在手指上挂着一橡皮带似的扭了几扭，叭儿一声就给甩到了墙上。”绝妙的讽刺，尖刻的语言，令人捧腹大笑。作家在动词选用上的准确、生动、大大生色了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它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的勾勒，更可贵的是深层次的心灵折射。

在张天翼的笔下，语言的动感有时候又表现为跳跃式的、类似于卓别林式的节奏感。这在《包氏父子》中尤为突出，小包在郭纯家里的梳洗打扮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于是他就把司丹康涂在梳子上梳上去。他对着镜子细细地看：不叫翘起一根头发来。这么过了五六分钟，梳子才离开了头发。他对镜子正面瞧瞧，偏左瞧瞧，偏右瞧瞧。他抿一抿嘴。他脖子轻轻扭一下。他笑了一笑。他眯眯眼睛。他扬扬眉毛，又皱着眉毛把脑袋斜着，不知道是什么根据，他老觉得一个美男子是该要有这么付脸嘴的，

一个穷酸的“花花公子”，一个死要面子连夹里都不要的小丑，“跳”到你的面前。作家尽情地表现他的丑态，是夸张，是讽刺，是无情鞭挞。在不惜笔墨、淋漓尽致描绘中，语言动感表现为跳跃式的，富于节奏，其艺术效果是十分强烈的。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的代表作品。华威先生是一个假抗日的官僚典型。作家给华威先生贯穿一个动作：忙。一个“忙”字统领着全篇，结构着全篇。他忙于赴会，忙于发言，忙于打进一切抗日组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忙。小说中华威先生处处表现为一种快节奏：“匆匆忙忙”的与人握手，“跨上他的包车”；“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走出会场的时候，“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扶，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通篇的一贯之的忙的动感，鲜明地揭示了华威这个官僚典型的性格核心——强烈的权力欲，却又被他装模作样的表面洒脱所掩饰。

《猪肠子的悲哀》中的主人公，是个有着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他在主张时代要求我们写新的东西的时候，却从没在文章上“写出过真的我”。他明明不爱一个女人，却因为她父亲有钱而要跟她结婚。作家在这一双重性格人物的欢喜无常的变化中，语言的动感依然具有卓别林式的讽刺效果。主人公猪肠子喝酒高兴的时候，“他用筷子在桌上敲着拍节，拿鼻子哼着Carmen里的歌曲。”当有人挖苦他在厚厚的地毯上，暖热的电炉旁谈谈革命，也谈谈女人时，他又成了另外一个人：

“真放屁，”猪肠子发了脾气，嘴唇成了白色。

“……他是什么狗东西！我落伍，他不落伍，他是时代的先驱，真不要脸！……操他娘，我老子的文章还不知他看不看得懂哩！他还得再读二十年书来跟我说话！”

他把那本杂志扯成几片，撕得粉碎，狠狠地摔到地上。

这种喜的动感和怒的动感，或称之为双跳跃式的节奏感十分有利于作家创造自己笔下的讽刺人物形象。

由此观之，漫画式的语言动感得力于作家应付自如地驾驭动词的能力。首先是准确、生动，其次是恰到好处的夸大，再次是鲜明的对比，第四在笑中显锋芒。于是使讽刺悄无声色，在幽默中使读者领略尖峭的语言美感。

### 三、多样化的修辞手法

张天翼在他的讽刺小说中，常常运用一些令人发噱的比喻、对比、迭词、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讽刺小说的语言诙谐有味，增强了讽刺小说“笑”的艺术效果。

比喻的新奇。张天翼讽刺小说中的比喻总是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揭示人物的心理，而又不失为新奇。比如，梁副官“笑起来可象坏鹅”。炳生得知可以安排司书的位置，“一身的血在狂奔，心脏上有三百条蜈蚣在爬着样子。”这种激而动之的神态，连同后来他“用发疟疾似的手去接了大信封”一样，是炳生近乎病态心理的传神之比，它暗示了“斜皮带”的得而复失，甚为巧妙（《皮带》）。再如，庆二伯娘在揭人家隐私的时候浑身来劲，她“说得挺流利，一句接一句象瀑布似的，一个不留神就得听漏了一大串”（《一题材》）。而衣冠禽兽的族绅长太爷在煞费苦心打任三嫂主意的时候，“他左腿叠在右腿上。右手的小指忙着剔牙齿。脸上象涂着蜡，一线阳光斜到他右边腮巴上，颧骨那儿就象个玻璃瓶似的发亮。”“叠着的腿子一上一下地抖了起来，大襟上沾着一片瓜子壳就颤动得象大洋里的小划子”（《脊背与奶子》）。这无疑是为君子长太爷淫心跳荡、急不可耐的生动写照。

有时候看似平淡的比喻，另有潜台词。如“日子走得比处长姨爹的汽车还快”，以日子之快言升迁之慢，透视出炳生谋职的急切心理。有时候作家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毫不留情地撕下讽刺人物的假面具，如“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来，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华威先生》）。

形象化的迭词运用。张天翼运用迭词的频率很高，在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这在速写勾勒小说中的人物时，既生动鲜明，又精彩纷呈。

有些迭词讽刺味极浓，比如，邓炳生要请梁处长“栽培栽培”，包国维跟那几个同学走起路来都是一样的姿势，“齐脑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摆一摆的”。

有时候迭词的选用又极富讽刺人物的神韵，如梁副官对勤务兵自然是慢条斯理：“摸摸脑袋摆摆手”，以显示自己的身份。而郭纯对包国维则是另一付做态：“撇撇嘴，翘翘下巴”，是那样的不屑一顾。作家对老包的描写更多的带有同情和怜悯，写他在债主面前“笑的嘴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抽的”。

有时候迭词增加了人物的动感，又颇为传神；包国维梳洗头时对着镜子“正面瞧瞧，偏左瞧

瞧，偏右瞧瞧”，“他笑了一笑，他眯眯眼睛，他扬扬眉毛”。

除了动词的相迭外，张天翼还经常使形容词相迭。例如，“轻轻地”嘘气，“微微地”颤抖，“油腻腻”的刀，“光光亮”的头发，“隐隐地”装鬼脸，“密密的”字等。作家描绘华威先生虚伪的言行更是独具“风采”，他总想“畅畅快快”与人谈谈，可总是没有时间，于是他“匆匆忙忙”地跟人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就走。他出席各种会议，主席打断发言的人让他发表高见，他站起来：“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一旦他得到满足，便“轻轻地拍几下手板”。发怒时，他又“冷冷地”瞅人。作家通过这些迭词使我们形象地感触到旧社会官僚政客们那一副庸俗、虚伪、装模作样的形态，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还有象声词的选用：包国维把肚子贴着桌沿，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那张方桌就咕咕地叫。长太爷用手剔牙齿，“听得见指甲割着牙齿响——嘎嘎。”只要有机会，作家绝不放过对讽刺人物进行谩骂、嘲讽，又使作品增添了声觉的效果。

有时候作家还巧妙地使用词语复沓，比如炳生看到上士在看书，问他是不是想升官，上士回答：“我哪想升官，我连希望都不希望。”“希望”一词本是指对某一事物的企求，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思维过程，经作家一复沓，变成了连思维一下都不曾“希望”过，还谈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官帽儿，绝妙之至。它反衬了炳生对升官发财之饥、之渴、之痴。

人物语言的对比。对比往往能使讽刺人物的形象更鲜明，更深刻，而且还能使人物的心灵深处彻底曝光。

同一人物的前后对比，庆二伯娘最仇恨男女间的那种风流事，“我并不是要叫个人跟我一样——死了叫人立贞节坊。我守了五十年节，这些事我怎么也看不惯。……”但是，当翰少爷用了心计后，贪财的庆二伯娘才不得不出自己的风流事：“嗯——嗯——那个……那个……真的，只有一回吧，真的。……”原来她也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而且还“好几次哩！”多么鲜明的对比，多么辛辣的讽刺，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邓炳生讨厌“梁副官那象鹅叫的笑，喊人的时候的鼻音”，是那么“可恶”、“卑鄙”。但是当他升了官，他的意识、观念全变了：“喊人的时候，……也学了梁副官的，用九成鼻音”。而且也“昂着脑袋，硬着脖

子，叫江‘便’铺被、倒茶”。前后判若两人，淋漓酣畅地刻划出炳生“往上爬”的丑恶卑劣的心态。

同一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对比：小包在郭纯面前，有如老鼠见到猫，没了主见，任人宰割。郭纯尖着嗓子调戏女学生，小包“象唱双簧似地也学了一句，对郭纯伸一伸舌头。”郭纯要小包显点本事看看，小包就会伸手在一个女学生的“大腿上拧了一把”。郭纯对他冷落的时候，他会浑身不对劲，想方设法亲近郭纯，要郭纯注意他。但是小包一回到家，在老包面前，他又变成了天皇老子。老包怕他声高，怕他光火，用“讨饶的声调”，轻轻地喊他。即使小包喷了他一脸的星子，他也想不出小包干么那么发怒。

华威先生则是个随机应变，逢场合说话的老手，他喜怒无常，一会儿一个脸面。他谦和的时候，“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肯当主席。”可一会儿，便指手划脚由他推举起主席来，而且“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过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他在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发言，可谓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可在青年们面前，一听说有个会没找他参加，“猛地跳起来：‘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我怎么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

‘妈的！这个这个——青年！’……”他出口骂娘了！在对比中，作家把讽刺的利笔伸进了华威先生虚假而又虚弱的内心世界里去。

有意识的夸张。在张天翼的小说中，夸张往往是作家塑造人物的神来之笔。当《稀松的恋爱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两个月后“火箭式”恋爱“成功”的时候，作家为他们算了一笔帐：

猪股糖一百三十四盒。

甜酒两打又三瓶。

逛公园每周二次。

看电影每周四次。

Picnic六十六次。

抒情诗六十九首。

上馆子二百余次（详见他俩的日记）

余从略。

共计用银一千五百余元，

费时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小时。

这一夸张的讽刺，揭露了主人公的虚伪、庸俗和可笑，婚姻在他们只是一种交易。“这些角色恋爱是比屋檐上的猫叫大路上的狗咬还不如的，因为它们并没有这么浓厚的‘买卖’色彩。”<sup>①</sup>

在《脊背与奶子》中，作家对长太爷的贪色本质的描绘，融合了动感、声感和情感：“他左腿叠在右腿上。右手的小指忙着剔牙齿。”后来，“右手剔牙齿得更起劲，仿佛要给自己的牙齿一点儿王法什么似的。自己听得指甲割着牙齿响一一夏，夏，唾沫沾着手心流下来。”这一夸张的手法，生动地表现了长太爷意欲占任三嫂的便宜而“馋涎欲滴”的心理和丑态，可谓妙不可言。

有时候作家又是通过神奇的比拟来施展夸张的才能的。如小包不是读书的料，但一谈起篮球“怪起劲的，眉毛扬得似乎要打眼睛上飞出去”。年轻的炳生一听到革职的别名，“另候任用”时，他眼睛花起来，“一切在打旋，在跳动。挂在衣架上的斜皮带飞了起来，飞在半空，忽然裂成粉碎。灰布衣和军帽变成一团黑东西。上面有两支放光的眼睛。”为了达到“笑”的艺术效果，作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对笔下的人物进行有意识的夸张，以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sup>①</sup>胡风：《张天翼论》，收入《张天翼研究资料》。